

斯特劳斯文集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面具之道

LA VOIE DES MASQUES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著
Claude Lévi-Strauss

张祖建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之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列维·
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斯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
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
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
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
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
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 = = = 列维·斯特劳文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 列维·斯特劳文集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
斯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
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 = = = 列维·斯特劳
-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
::: 列维·斯特劳文集列维·斯特劳文集 <<<<<<<< 列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斯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
ξ 列维·斯特劳文集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
-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
++++++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特劳文集 列维·斯

J538.3/2

2008

Claude
Lévi-Strauss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7 面具之道

LA VOIE DES MASQUES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著

Claude Lévi-Strauss

张祖建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Claude LÉVI-STRAUS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A VOIE DES MASQUES

édition revue, augmentée, et rallongée de

TROIS EXCURSIONS

PLON

原书扉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具之道/(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 张祖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7)
ISBN 978-7-300-09417-5

- I. 面…
- II. ①克…②张…
- III. 面具-艺术-世界
- IV. J53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827 号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 ⑦

面具之道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著
张祖建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7.625 插页 7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8 000	定 价	42.00 元 (精装)		
			22.00 元 (平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以及当初五位“结构主义大师”中今日唯一健在者。在素重人文科学理论的法国文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民族思想英雄”之代表应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下称“文集”）中文版在作者将届百岁高龄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中法人文学术交流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实践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关于作者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意义，各位译者均在各书译后记中作了介绍。在此，我拟略谈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在战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作为专业人类学家和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上。在人类学界，作为理论人类学家，50年来其专业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家”，其声势在结构主义运动兴盛期间竟可直逼萨特，甚至曾一度取而代之。实际上，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

义思潮的第一创始人，其后结构主义影响了法国甚至西方整整一代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比萨特更为重要之处则表现在，其影响不限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而是同时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诸相关学科领域内促成了各种多学科理论运作之交汇点，以至于以其人类学学科为中心可将其结构理论放射到许多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同时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评者，其理论方法又可直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思考。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法国学术环境内，他选择了与英美人类学更宜沟通的学科词 *anthropology* 来代表由自己所创新的人类学—社会学新体系，在认识论上遂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他企图赋予“结构人类学”学科的功能也就远远超过了通常人类学专业的范围。一方面，他要将结构主义方法带入传统人类学领域；而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结构人类学思想来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作为其学术思想总称的“结构人类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大致可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以至于文艺创作手法），以及数学等自然科学……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根本转变了世界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而且对上述各相关学科理论之方向均程度不等地给予了持久的影响，并随之促进了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和方向的演变。另外，作者早年曾专修哲学，其人类学理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并被现代哲学界视为战后法国代表性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影响力并非如英美学界惯常所说的那样，仅限于那些曾引起争

议的人生观和文化观方面，而是特别指他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结构进行的深刻反省和批评。后者才是列维-斯特劳斯学术理论思想的持久性价值所在。

在上述列举的诸相关学科方法论中，一般评论者都会强调作者经常谈到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哲学对作者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方式所给予的重大影响。就具体的分析技术面而言，诚然如是。但是，其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乃是与作者对诸相关传统学科理论方向的考察和批评紧密相连的。因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更为深广的思想学术背景。这就是，结构人类学与 20 世纪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法国三大主要人文理论学科——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正是在与此三大学科系列的理论论辩中形成自己的结构人类学观念的。简言之，结构人类学理论批评所针对的是：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方向，社会学的狭义实证主义（个体经验主义）方向，以及历史学的（政治）事件史方向。所谓与哲学的论辩是指：反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继续选择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作为各科学术的共同理论基础，衍生而及相关的美学和伦理学等部门哲学传统。所谓与社会学的论辩是指：作者与法国社会学和英美人类学之间的既有继承又有批判的理论互动关系。以现代“法国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学”本身即传统人种志学（ethnography）、人种学（ethnology）、传统人类学（anthropology）、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百年来综合互动的产物；而作为部分地继承此法国整体主义新实证社会学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在扩大的新学术环境里进一步深化了该综合互动过程。因此作者最后选

用“结构人类学”作为与上述诸交叉学科相区别的新学科标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革新意义。所谓与历史学的论辩是指：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两方面作者所坚持的历史人类学立场。作者在介入法国历史学这两大时代性议题时，也就进一步使其结构人类学卷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激辩之中心。前者涉及和萨特等历史哲学主流的论辩，后者涉及以年鉴派为代表的 150 年来有关“事件因果”和“环境结构”之间何者应为“历史性”主体的史学认识论争论。

几十年来作者的结构人类学，尽管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却也受到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美国人类学和法国社会学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一个原因似乎在于彼此对学科名称，特别是“人类学”名称的用法上的不同。一般人类学家的专业化倾向和结构人类学的“泛理论化”旨趣当然会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彼此相异。而这类表面上由于学科界定方式不同而引生的区别，却也关系到彼此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的更为根本的差异。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思想触及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基础的核心领域。与萨特以世界之评判和改造为目标的“社会哲学”不同，素来远离政治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乃是一种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学术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结构人类学，正像 20 世纪西方各种人文学流派一样，都具有本身的优缺点和影响力消长的过程。就法国而言，所谓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相互嬗替”的历史演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足以作为评判学派本身重要性的尺度。当前中国学界更不必按照西方学术流派演变过程中的一时声誉及影响来判断其价值。本序文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的推

崇，也不是仅以其在法国或整个西方学界中时下流行的评价为根据的，而是按照世界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革新之自身需要而加以评估的。在研究和评判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时，需要区分方向的可取性和结论的正确性。前者含有较长久的价值，后者往往随着社会和学术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有所改变。思想史研究者均宜于在学者具体结论性话语中体察其方向性含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的积极认知范围。今日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的价值因此不妨按照以下四个层面来分别评定：作为世界人类学界的首席理论代表；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首席代表；作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理论进行学术交流中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逢战后法国两大思想运动“大师凋零”之会，法国学界开始了对结构主义时代进行全面回顾和反省的时期，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一生的卓越学术贡献重新受到关注。自著名的《批评》杂志为其九十华诞组织专辑之后，60年代初曾将其推向前台的《精神》期刊2004年又为其组编了特刊。我们不妨将此视作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生平回顾”纪念活动之序幕。2007年夏在芬兰举办的第9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亦对时届百龄的作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凡此种种均表明作者学术思想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持久影响力。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的学术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也将在不断扩展中的全人类思想范围内，继续参与积极的交流和演变。

作为人类文化价值平等论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文化思想多次表示过极高的敬意。作者主要是通过法国杰出汉学家和社会学家格拉内（Marcel Granet）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思

想的特质的。两人之学同出涂尔干之门，均重视对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论和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在2004年出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纪念文集》（L'Herne出版社，M. Izard主编）中有伊夫·古迪诺（Yves Goudineau）撰写的专文《列维-斯特劳斯，格拉内的中国，涂尔干的影子：回顾亲属结构分析的资料来源》。该文谈到列维-斯特劳斯早年深受格拉内在1939年《社会学年鉴》发表的专著的影响，并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如何从格拉内的“范畴”（类别）概念发展出了自己的“结构”概念。顺便指出，该纪念文集的编者虽然收进了几十年来各国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概述，包括日本的和俄罗斯的，却十分遗憾地遗漏了中国的部分。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对于中国当代西学研究之进展，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

百年来中国学术中有关各种现代主题的研究，不论是政经法还是文史哲，在对象和目标选择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际学术的共同标准，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发展趋势。结构主义作为现代方法论之一，当然也已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所吸纳。但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法国结构主义对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主要意义却是特别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研究之现代化方法论革新的任务有关的。如我在为《国际符号学百科全书》（柏林，1999）撰写的“中国文化中的记号概念”条目和许多其他相关著述中所言，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形态具有最突出的“结构化”运作特征（特别是“二元对立”原则和程式化文化表现原则等思考和行为习惯），从而特别适合于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其现代分析工具之一。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文本制作”中凸显出一种结

构式运作倾向，对此，极其值得中国新一代国学现代化研究学者关注。此外，之所以说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各种现代西方学术方法论中最适合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工作需要者，乃因其有助于中国传统中国学术思想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系统的“重新表述”，此话语组织重组的结果无须以损及话语和文本的原初意涵为代价。反之，对于其他西方学术方法论而言，例如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在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相异的观点和立场一并纳入中国传统思想材料之中，从而在中西比较研究之前就已“变形”了中国传统材料的原初语义学构成。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是在前科学时代构思和编成的，其观念表达方式和功能与现代学术世界通行方式非常不同，颇难作为“现成可用的”材料对象，以供现代研究和国际交流之用。今日要想在中西学术话语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话语和现代西方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首须解决二者之间的“语义通分”问题。结构主义及其符号学方法论恰恰对此学术研究目的来说最为适合。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许多符号学的和结构式的分析方法，甚至又比其他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性。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围内的中西对话之目的绝不限于使中国学术单方面受益而已，其效果必然是双向的。中国研究者固然首须积极学习西方学术成果，而此中西学术理论“化合”之结果其后必可再反馈至西方，以引生全球范围内下一波人类人文学术积极互动之契机。因此，“文集”的出版对于中国和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全面革新这一总目标而言，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文集”组译编辑完成后，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代

为撰写一篇“文集”总序。受邀为中文版“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作序，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幸。我本人并无人类学专业资格胜任其事，但作为当代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学术思想史以及中西比较人文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者，对此邀请确也有义不容辞之感。这倒不是由于我曾在中国最早关注和译介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而是因为我个人多年来对法国人文结构主义思潮本身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在北京（2004）、里昂（2004）和芬兰伊马特拉（2005）连续三次符号学国际会议上力倡此意，强调在今日异见纷呈的符号学全球化事业中首应重估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价值。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正是这一人文科学方法论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者。

结构主义论述用语抽象，“文集”诸译者共同努力，完成了此项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但在目前学术条件下，并不宜于对译名强行统一。在一段时间内，容许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专有名词的译法，是合乎实际并有利于读者的。随着国内西学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或许可以在将来再安排有关结构主义专有名词的译名统一工作。现在，“文集”的出版终于为中国学界提供了一套全面深入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原始资料，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长期研究者，我对此自然极感欣慰，并在此对“文集”编辑组同仁和各卷译者表示诚挚祝贺。

李幼蒸 2005 年 12 月

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译者序

众所周知,《面具之道》是长期学术准备的结果。1956—1971年,列维-斯特劳斯曾经用了四个学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与南北美洲神话分析有关的课程,1971年出版了《神话学》第4卷,1973年发表了《结构人类学(2)》。在1971—1972年度的法兰西学院课程里,作者把注意力再次投向北美洲太平洋沿岸民族的神话和面具的变化方式。1973年和1974年夏天,他两度前往英属哥伦比亚,研究面具和有关神话。这些工作都为本书写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面具之道》的写作大约用去四年,初版于1975年由专门从事艺术出版的瑞士出版商阿尔贝·斯基拉刊行。1979年法国普隆书局再版时增加了初版以后发表过的三篇论文,第一篇原题为“一个结

构的历史”，目的是证明结构分析和种族史考察并不矛盾。第二篇文章原名“高贵的蛮族”，重版时作过改动和增补，内容来自于作者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家宅型社会的课程，并且把夸扣特尔人、法国加洛林王朝和中世纪日本社会加以比较，力图在北美太平洋沿岸、美洲其他地区 and 亚洲的神话之间的交集点（亲属称谓，单/双系继承制度和姓氏嗣袭等）之间搭起桥梁。第三篇也在重新发表以前作过修订。文章分析了一副面具及其起源神话，同时回答了《面具之道》第一版问世以后引起的一些异议。读者面前的这个汉译本是根据1979年普隆书局版翻译的，同时参考了英译本（*The Way of the Masks*, translated by Sylvia Modelsk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Vancouver/Toronto, 1982）。

北美太平洋西北海岸（含英属哥伦比亚、阿拉斯加州和华盛顿州）的印第安艺术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旅居纽约期间（1941—1947）发现的。他那时经常光顾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藏品展厅，而且与超现实主义者和安德烈·布列东等人（参见本文集之附卷《列维-斯特劳斯传》第三章）一道从古董商手里搜购印第安人的艺术品。从那时起，他开始注意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的面具。不消说，这与他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喜爱和敏感是分不开的。但是，印第安艺术不仅满足了他个人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从他于1941—194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多用英语写成），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利用这种机会表达了对这些艺术品的高度评价和艺术平等主义观念。

这本书围绕着三种面具展开分析：萨利希人的斯瓦赫威面具（swahwé），努特卡人和夸扣特尔人的赫威赫威面具（xwéxwé）和夸扣特尔人的皂诺克瓦面具（dzonokwa）。他对这些面具的美学特

点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们堪与古埃及或古波斯和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品媲美，“有朝一日定会从民族志博物馆移入美术馆”。不仅如此，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提出了一些分析方面的问题（见原文第16~17页）：为什么同类面具的制作方式、风格和样式不同？“为什么嘴是大张着的？为什么这个悬吊的下颚要突显一条肥硕的舌头？那些鸟头跟其余部分显然无关，何以如此怪异地摆放在这儿？为什么那些暴突的眼睛构成了各路面具的一个不变的特征？最后，这种凶神恶煞似的风格，不仅在相邻文化里，而且在其诞生地的文化里也绝少有相似之物，那么它从何而来呢？”因此，他既没有停留在这些面具的造型和视觉艺术的价值上，也没有只把它们视为民族志的资料，而是从面具的结构性特点入手，结合它们的仪式功能，提出了更为广泛的人类学方面的问题。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本书的名字。本书原名“面具之道”所用的法语 *la voie* “道路”一词，与 *la voix* “声音”是谐音的。言外之意，“面具是发声的”。利用双关语起书名，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并非头一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这套文集集中的《人类学讲演集》，原名法语 “*Paroles données*” 也有“诺言”和“说出的话”两解。从这个角度看，列维-斯特劳斯显然是要告诉读者，这些印第安面具不仅仅是静止不动的审美对象，同样也在“说话”。那么，它们传递的究竟是什么信息呢？

作为民族学家，他的分析的支点仍然是有关面具起源的众多神话，他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面具跟神话一样，无法就事论事地，或者单从作为独立事物的面具本身得到解释。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只有放入各种变异的组合体当中，一个神话才能获得意义。同样道理，不过单从造型方面来看，一种类型的面具是对

其他类型的一种回应，它通过变换后者的外形和色彩获得自身的个性。”（原文第 18 页）这样一来，他就把已经在神话研究中获得验证的结构主义分析原则和方法扩大到了印第安面具上。他的设想是：无论是面具的造型，还是有关面具起源的神话之间的嬗变，支配这两种转换的是性质相同的一种关系。作为分析的工具，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了大量常见于结构主义分析的对立或对称的概念，例如：原型/变体，前时/后时，开放/封闭，横轴/竖轴，天空/陆地（或水下），男/女，雄/雌，亲/疏，父系/母系，人/妖，乱伦（或人兽交）/远婚，铜板/面具，暴突/凹陷，黑/白，政治经济利益/血缘联系，肉/鱼，狗/奴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机械地运用这些概念，被否定的东西很可能是要肯定的东西：“同神话一样，一副面具既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因为它不光来自于它所表达的或者它认为能够表达的，同样来自于它所排斥的。”（原文第 44 页）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使他能够从面具和神话分析中发现一些规律，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他所说的“对称性颠倒”。简而言之，他的分析所达到的结论是：当造型保持不变时，信息的内容即语义功能是相反的；当信息的内容保持不变时，造型却是相反的（原文第 123 页）。这样，他便能够对神话中一些看起来不合逻辑的现象和情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兼研究神话的民族学家和偏爱艺术品的审美家于一身，把语言的篇章结构的语义分析与民俗器物的分析融为一炉，从而把分散的甚至时而矛盾的线索贯穿了起来。另外，本书也多处提到结构主义分析所具有的“罔顾历史”的诟病，用分析实例申明结构分析与历史是互为补充的一贯看法。

虽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著述中，处理这种题材是唯一的一次，但本书却涉及他的所有研究领域，从种族志到神话，从造型艺

术到礼仪，从社会结构到世袭制度，直到姓名学，这本小书运用了多种表达手段：引述神话传说，不同时期的风俗照片和面具藏品照片、地图和示意图。通过分析一系列对立和颠倒现象，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一幅跨越数个世纪，在一个幅员广阔、部落众多的地域当中，印第安面具与神话的延续和变化的图景。

作为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对人类文明当中跨越文化和时光的“不变量”感兴趣。就造型艺术而言，我们记得，早在1945年（即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1）》第13章），他就曾经把印第安人的裂分式表现方法与中国青铜器图案作出比较。在这本研究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面具的书里，他再次将其与中国周朝墓葬的考古发现，以及日本民间对于地震与鲑鱼之关系的传说联系起来。在一本纪念班维尼斯特的文集（1975年）里，他还把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与古希腊的神话作出比较，并且提出了二者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相同的逻辑机制的看法。应当说，这种在时空如此遥远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从来未试图从此类比较中得出关于社会演进的普遍法则。这种谨慎的态度与他承认“无法节约的历史偶然性”（参见例如《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法文版第408页）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这本书的人类学地位及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译者不是人类学家，故未敢置喙。尽管如此，至少应当说，此书不仅再次证明了结构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功效，同时也为处理艺术风格一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分析范例。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这套“列维-斯特劳斯卡文集”的14部书中，这一本当为最后面世的一部。在文集的筹划、编辑和出版的